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GREAT ENTERPRISE

# 洪业

清朝开国史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 东 主 编  
周文彬 总策划

K249

W1



THE GREAT ENTERPRISE

# 洪业

清朝开国史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美〕魏斐德 著

陈苏镇 薄小莹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Wakeman, F. E.)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 —1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ISBN 7-214-00923-4

I. 洪... II. ①魏... ②陈... ③薄...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127 号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 书 名 洪业——清朝开国史  
著 者 [美]魏斐德  
译 者 陈苏镇 薄小莹等  
责任编辑 周文彬 汪意云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安市楚州区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21.75  
字 数 8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923-4/K·95  
定 价 4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 目 录

## 导 言 / 1

## 第一章 北部边防 / 7

明朝的卫所制度 / 8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 10      努尔哈赤的崛起 / 12      吞并辽东 / 14      满汉种族冲突 / 17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 20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 22

## 第二章 崇祯朝廷 / 24

士大夫的社团 / 26      科举生涯 / 32      温体仁当政 / 35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 38      周延儒的荣与衰 / 42

## 第三章 满族势力的扩张 / 46

汉族合作者 / 47      大凌河之围 / 50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 54      边民与海盗 / 60      皇太极称帝 / 63      攻克松山 / 65      洪承畴之降 / 68      锦州的陷落 / 69

## 第四章 北京的陷落 / 71

李自成起兵问鼎 / 72      南迁之议 / 76      崇祯皇帝的末日 / 82      大顺的臣民 / 84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 90  
吴三桂 / 93      多尔袞决心介入 / 97      大举南下 / 100

## 第五章 南京政权 / 103

史可法与军阀 / 104      明朝的皇室贵族 / 107      皇位继承危机 / 110      四镇 / 112      党争复起 / 115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 119      顺案 / 123      政治迫害 / 125      南京政府的困境 / 127      扬州的忠臣 / 130      和谈 / 132

##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 136

地方合作者 / 136      山东的投降 / 140      北人与南人 / 143  
清除明代弊政 / 147      部分改良 / 150      满人的弊政 / 154

旗地与奴隶 / 155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 158      保卫京城 / 160      抵抗活动的再起 / 163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 166

## 第七章 南京的陷落 / 170

勤王选择 / 171      献身与妥协 / 173      满人渡河 / 174  
童妃案 / 176      伪太子 / 178      左良玉兵变 / 181      进攻扬州 / 184      史可法与多尔衮 / 186      扬州十日屠 / 188  
史可法功过评价 / 192      弘光帝出逃 / 194      南京的投降 / 198      大赦 / 200      改换门庭 / 201

## 第八章 江南的抵抗运动 / 205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 207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 209      社会依附关系 / 212      阶级矛盾 / 214      农奴暴动 / 217  
合作恢复秩序 / 219      剃发令 / 222      地方抵抗运动 / 223  
嘉定的崩溃 / 225      太湖义军 / 227      第一次松江起义 / 229      遁世隐居 / 232

## 第九章 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 236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 237      山地的“带发”人 / 240  
山东的清剿 / 242      地方官与胥吏 / 244      保甲制 / 246  
有区别的恩赦 / 248

## 第十章 “危时计拙” / 250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 251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 252      溧阳、淮阳起义 / 254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 256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 259      兜捕文人学士 / 261      淮安之谋 / 263      清廷的猜疑 / 266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 268      万寿祺和顾炎武 / 270

##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 275

榆园军 / 276      刘泽清案件 / 279      1648年的回民起义 / 280      姜瓖之乱 / 284      征服西部 / 290      陕西东南与汉水高地 / 294      山西山匪 / 296      总督、缙绅和乡长 / 300

## 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 302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 303      多尔衮专权 / 305      南北之争 / 308      弹劾冯铨事件 / 309      满汉两头政治 / 310  
指控亲王 / 313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 315      多尔衮的威福

及其薨歿 / 318

### 第十三章 顺治朝 / 320

皇帝亲政 / 321      吏治改革 / 323      清洗都察院 / 326  
抑制贵族 / 328      了结旧账 / 329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  
努力 / 331      皇帝与殉难者 / 334      索贿者与吏治腐  
败 / 335      考课与朋党 / 336      任珍案 / 339      仿效明初  
之制 / 342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 345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  
判 / 349

### 第十四章 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 351

南明海军的威胁 / 351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 354      清廷  
专制与满人至上 / 356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 360      清廷  
信用汉人的后果 / 362      郑成功的进袭 / 364      社会与政治  
的均平 / 366      赋税制度改革 / 369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  
击 / 371

###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 374

最后的明朝忠臣 / 375      公德与良知 / 378      三藩之  
乱 / 381      范承谟的殉难 / 384      清朝的忠君思想 / 387

### 附 录 / 393

A. 出仕两朝的大臣 / 393      B. 1644 年的“贰臣” / 399  
C. 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 400

### 注 释 / 401

导言及第一章 / 401      第二章 / 424      第三章 / 439      第  
四章 / 452      第五章 / 474      第六章 / 497      第七章 / 518  
第八章 / 534      第九章 / 558      第十章 / 565      第十一  
章 / 579      第十二章 / 588      第十三章 / 596      第十四  
章 / 613      第十五章 / 631

### 中文、日文引书目 / 645

### 西文引书目 / 660

### 译后记 / 687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sup>①</sup>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sup>②</sup>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sup>③</sup>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sup>④</sup>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

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 25 万至 26.5 万公斤。<sup>⑤</sup>

- 4 1620 年至 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  
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sup>⑥</sup>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在 17 世纪 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 41 艘,到 1629 年便降为 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  
5 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sup>⑦</sup>17 世纪 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sup>⑧</sup>但不久,即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sup>⑨</sup>1634 年后,  
6 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 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sup>⑩</sup>

-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 1635 年至 1640 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  
7 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sup>⑪</sup>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sup>⑫</sup>,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 1626 年到 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sup>⑬</sup>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sup>⑭</sup>经过这场浩劫,晚明  
8 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 1585 年到 1645 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 40%。<sup>⑮</sup>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 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sup>⑯</sup>

-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  
9 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sup>⑰</sup>一部修于 17 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 17 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sup>⑱</sup>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sup>①</sup>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sup>②</sup>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sup>③</sup>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sup>④</sup>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sup>⑤</sup>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sup>⑥</sup>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sup>⑦</sup>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sup>⑧</sup>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官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sup>⑨</sup>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sup>⑩</sup>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sup>⑪</sup>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sup>⑫</sup>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sup>⑬</sup>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

- 14 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惟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sup>②</sup>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sup>③</sup>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sup>④</sup>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sup>⑤</sup>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sup>⑥</sup>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sup>⑦</sup>

-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  
16 (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sup>⑧</sup>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sup>⑨</sup>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sup>⑩</sup>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sup>④1</sup>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sup>④2</sup>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sup>④3</sup>

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sup>④4</sup>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sup>④5</sup>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sup>④6</sup>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sup>④7</sup>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sup>④8</sup>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袞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

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sup>④9</sup>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

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盜、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袞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20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sup>④</sup>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sup>⑤</sup>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sup>⑥</sup>因此,21 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sup>⑦</sup>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 第一章 北部边防

23

游骑不听能汉语，  
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东南卑湿地，  
定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吞声仰诉天，  
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  
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  
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  
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  
汉心汉语吐蕃身。

白居易：《缚戎人》。

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sup>⑤</sup>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sup>⑥</sup>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sup>⑦</sup>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sup>⑧</sup>。

25

##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26 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sup>②6</sup>最初,每个军士受田 15 亩以维持生活。1365 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 50 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 25 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 3 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 100 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sup>②7</sup>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sup>②8</sup>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27 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sup>②9</sup>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 15 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sup>③0</sup>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 200 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sup>③1</sup>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 16 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 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sup>③2</sup>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sup>③3</sup>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sup>③4</sup>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成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

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sup>⑧</sup>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sup>⑨</sup>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首领也先俘获 31 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sup>⑩</sup>

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sup>⑪</sup>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sup>⑫</sup>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sup>⑬</sup>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sup>⑭</sup>

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sup>⑮</sup>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 33 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购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sup>⑯</sup>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sup>⑰</sup>

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 35 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sup>⑱</sup>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sup>⑲</sup>这项庞大 36 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

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sup>37</sup>(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

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sup>38</sup>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sup>39</sup>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sup>40</sup>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sup>41</sup>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sup>42</sup>

###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sup>43</sup>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sup>44</sup>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sup>45</sup>

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sup>46</sup>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惟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sup>47</sup>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sup>48</sup>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sup>49</sup>

41 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